

【论 文】

苏联、俄罗斯联邦族群识别的状况、方式及利弊¹

何俊芳²

摘要：苏联在其历次的人口普查工作中，官方采取个人申报、一定程度上参考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族群名单进行族群的归并和分类等识别工作。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延续了这一族群识别方式，并增加了“亚群体”的类别，族群数量也明显增多。本文研究结论支持中国的民族识别不是模仿苏联的观点，并认为中、苏民族、族群识别的方式虽不同，但识别结果实质上都是国家给予了复杂的族体存在一种官方的认定。

关键词：族群识别；人口普查；苏联；俄罗斯

族群³识别是一个与个体、群体的身份认同、官方的民族政策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大多数多族群国家，并不会进行专门的族群身份认定工作，在人口普查资料中一般也不会专门调查每个人的族属认同倾向，但有些国家会对国内的居民进行族群身份认定，如中国、越南、老挝等。还有一些国家对国内的居民进行类似于族群识别的调查，如印度把国内的“部落民”划入少数民族，为了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印度人类学调查局也曾对他们的部落进行过识别⁴。美国虽没有过名义上的族群识别，但受美国政府资助，在 1980 年出版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中对美国的一百多个族群进行了区分和论述，这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标准进行的识别或界定⁵。苏联的族群识别有其自身的运作方式，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延续了这一方式，但在做法上有了一定变化，族群数量与苏联时期相比有了较大增长。那么，苏联、俄罗斯联邦进行族群识别的具体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当今俄罗斯对族群进行的“识别”与苏联时期有何不同？这一方式的利弊何在？中国的民族识别是源于对苏联族群识别的模仿吗？本文在探讨苏联、俄罗斯族群识别情况的基础上，拟对上述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学者了解相关议题提供参考。

一、族群识别的总体情况

（一） 苏联的族群识别情况

在整个苏联时期，实际上存在不同层面的族群分类和认定，如有身份证上的族群身份认定⁵，学界对族群的层级分类⁶，但最主要的是历次人口普查中的族群识别。

¹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²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³ 鉴于俄罗斯联邦官方已明确将“нация”（民族）一词用于国家民族层面，因此本文中将其国内的具体民族称作族群，而实际上俄语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会使用不同的与我国汉语相关的“民族”术语。参见何俊芳、王浩宇：“试论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世界民族》2014 年第 1 期。

⁴ 据一些研究，1991 年时印度共有 461 个部落，部落民 6776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8.08%。参见 Virginius Xaha, “Articulation of Autonomy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India”, 国家民委和香港科技大学主办《民族区域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 年），第 289 页。

⁵ 苏联从 1934 年开始在公民身份证上设置了“民族”栏（第五栏），一般是小于 14 岁的孩子由父母为其申报族属（通常按父亲的族属申报），14 岁以上的人自行选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于 1996 年起开始发放新的全俄统一的公民身份证，并在新的证件上取消了“民族”成分这一栏。

⁶ 在苏联的民族理论研究中，由于受到斯大林“族类共同体”（以下简称“族体”）以“部落（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нация）”为演进范式的理论影响，长期将其境内的族体区分为民族、部族和民族群体三类，即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民族结构是由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及一定数量的民族群体（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группы 或 этнический группы）组成的。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据 1970 年全苏人



1897年沙皇俄国曾进行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族群身份并没有列入普查的范围，但调查了全国人口的母语使用情况。在这次调查结果中列出的全国居民使用的语言和方言有110种，还列有其他语言一栏^[2]。

1926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苏联在1939、1959、1970、1979、1989年进行过5次全国人口普查，但历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有关族群数量的结论不尽相同。如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当时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不包括在内），在全苏联居住有190个大小族群^[3]。一般认为，1926年的普查是在相对自由、没有意识形态操纵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苏联居民的族群组成》^[4]一书中提供的数据，出现在1959、1979、1989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族群数量分别是121个、125个、128个，并均列有“其他族群”一栏。另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词典和百科全书网站及维基百科的人口资料，1939及以后4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出现的族群数量分别为96、118、119、120和125个，也列有其他族群一栏^[5]。下表中所列族群数量主要以前者资料为依据。

表1 苏联人口普查结果中的族称¹和族群数量

年份	1926	1939	1959	1970	1979	1989
个人填报的族称数量	644*	606*	749*	-	-	800**
官方认定的族群数量	190	99	121	122	125	128

* Из «Словар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для разработк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о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переписей <http://demoscope.ru/weekly/knigi/books11.php>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3-2004.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двенадцат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Отв. ред. А.Г. Вишневский. – М.: «Наука», 2006. с. 67.

对比苏联1939-1989年这5次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族群名单，可以发现有以下情况：

1. 一些族称只出现在1939年的族群名单中，如有巴斯克人、比利时人、挪威人、瑞典人；
2. 有的族称仅出现在1959年的名单中，如克雷兹人（Крызы）；
3. 有些族称仅出现在1989年的名单中，如鄂罗克人（Ороки）、楚瓦人（Чуванцы）、恩茨人（Энцы）；
4. 有的族称出现在1959和1989年的名单中，而在其他三次名单中没有出现，如利夫人（Ливы）；
5. 有的族称只出现在1979、1989年的名单中，如古巴人；
6. 有的族称出现于1939、1959和1989年的名单中，但在1970、1979年的名单中没有出现，如塔雷什人（Тальши）；
7. 有的族称出现在1959、1970、1979年的名单中，但在1939和1989年的名单中则没有，如蒙古人；
8. 有些族称只出现在1970、1979、1989年的名单中，如奥地利人、涅基达尔人（Негидальцы）、克罗地亚人；

口统计,加入这个共同体的有119个族体(народы),其中包括49个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40个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和30个民族群体(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группы)”等类别。“民族”一般指的是那些在人口数量上超过10万、并具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族体。部族则指现代那些虽已丧失了部落特征,但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的族体。民族群体是各类族体的部分,由于迁移、移民、驱逐、边界变迁等原因从其族体的核心分离了出来,生活在外族环境中的部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在其官方文件中实际上一直广泛使用“народ”的复数形式“народы”用于说明各类族裔共同体,因为这一概念是“非区别性的”,即是不区分族体类别的(从这一用法看不出各族之间有社会发展程度之分)。

¹ 苏联、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结果中所列的族称包括自称、他称,这些称谓或是宗教称谓,或是同一称谓的地方变体或方言变体等等形式。



9. 有的族称在 1959 年没有出现, 其他四次普查名单中均有, 如荷兰人;

10. 有些没有出现在 1939 年的名单中, 但在后四次的名单中均出现, 如阿古尔人 (Агулы)、伊捷利明人 (Ительмены)、阿留申人 (Алеуты)、匈牙利人、越南人、加告兹人、多尔甘人 (Долганы)、奥罗奇人 (Орочи)、卡拉伊姆人 (Караимы)、克特人 (Кеты)、科米-彼尔米亚克人 (Коми-пермяки)、鲁图尔人 (Ругульцы)、塔特人 (Таты)、托法拉尔人 (Тофалары)、乌定人 (Удины)、乌尔奇人 (Ульчи)、察胡尔人 (Цахуры)、切尔克斯人 (Черкесы)、因纽特人 (Эскимосы)、尤卡吉尔人 (Юкагиры)、克里米亚鞑靼人 (Крымские таттары)、克里米亚人 (Крымчаки)、恩加纳桑人 (Нганасаны), 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族作为一个族称出现在这四次人口普查的族群名单中。

从上可见, 在苏联的历次人口普查中, 族群的总体数量、包含的具体族群都会有所不同, 这种变化与其缺乏连贯的识别族群的国家原则有关。如本文后面所述, 一方面, 尽管苏联在人口普查时采取个人申报其“族群成分”(或“族称”)的原则, 体现着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尊重; 但另一方面, 在族群名单的确定上更多地却体现的是官方的意志。从上述的一些情况可见, 苏联时期人口普查中的族群识别有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如不仅存在有些族群会突然出现或者消失的问题, 而且有的族群人口数量上的变化也十分巨大, 最典型的如居住在阿塞拜疆的塔雷什人 (Талыши), 1939 年统计有 88026 人, 1959 年就仅有 162 人, 在 1970、1979 年的统计中消失, 1989 年时有 21602 人^[6]。再如, 在 1926 年的人口普查中统计有约 700 名楚瓦人 (Чуванцев), 1939 年时虽也算作一个族群 (按族称 Этели), 但没有单列, 而是归在“其他的北方族群”中。而在 1959 年、1970 和 1979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中则把所有自称为楚瓦的人归在楚科奇人 (Чукчи) 中, 当时民族学家称作是“族群融合”; 而 1989 年又根据民族学家的建议, 把楚瓦人重新统计为独立的族群^[7]。

(二) 俄罗斯联邦的族群识别情况

1、族群识别的结果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联邦于 2002、2010 年进行了 2 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的总体情况见下表。

表 2 2002、2010 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结果

年份	全国总人口数量 (单位: 人)	个人填报的族称数量	官方认定的族群数量	未列入族群名单中的其他族群人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单位: 人, %)	没有指出族属者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例 (单位: 人, %)
2002	145166731	776*	182	42980 0.03	1460751 1.01
2010	142856536	1620**	193	66648 0.05	5629429 3.94

数据来源: (文中 2002、2010 年数据均来自以下出处, 不再另行标注)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2002. Т. 4: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и владение языками,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Приложение 1. М.: Статистика России, 2004.

**Число этнонимов, упомянутых в таблице 4-03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РФ》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erepis2010/croc/perepis_itogi1612.htm

根据苏联 1989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当时俄罗斯的总人口数是 1.47 亿, 其中被承认的族群有 128 个, 其他族群即名单中未列入者 1.88 万人, 其中包括在普查表中未申报自己的族属者^[8]。

在俄罗斯联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中, 共出现了 776 个以上的族称, 最后确定了 194 个主要族称; 在普查结果中承认的族群有 182 个, 其中独立族群 142 个, 亚族群 (从属群体) 40 个。与苏联时期人口普查中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对像哥萨克人等作为亚族群的承认。另外, 在本次人口普查中, 出现的 100 人以下的族群有 18 个, 其中 10 人以下的有 2 个, 分别是科列克人 (Кереки) 8 人和卡伊塔戈兹人 (Кайтагцы) 5 人, 这种情况在苏联时期是极为少见。



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官方正式承认的族群数量增加到 193 个，其中独立族群 145 个，亚族群 48 个¹。与 2002 年相比，在族群名单中出现了 12 个“新的”族称，其中 7 个属于独立的族群，增加的这些族群主要的是原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人（Боснийцы），马其顿人（Македонцы）、斯洛文尼亚人（Словенцы）、克罗地亚人（Хорваты）、黑山人（Черногорцы），还有巴基斯坦人（Пакистанцы），仅帕米尔人（Памирцы）是以前归在塔吉克人中的原苏联的土著群体，但在 2010 年的族群名单中取消了原出现在 2002 年 142 个族群中的中亚阿拉伯人。5 个“新的”亚族群是归在鞑靼人下的麦谢拉人（Мишари），归在亚美尼亚人之下的切尔克索戛依人（Черкесогаи，6 人），归在库尔德人下的库尔曼奇人（Курманч，42 人），归在德意志人下的门诺尼特人（Меннониты）和归在诺盖人（Ногайцы）下的卡拉戛色人（Карагаши，16 人）。

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100 人以下的族群增加至 20 个，其中 10 人以下的有 8 个，1 个人的族群 2 个。人口数量在 10 人以下的族群分别是卡伊塔戈兹人（Кайтагцы）7 人、阿斯特拉罕鞑靼人（Астраханские татары）7 人，切尔克索戛依人（Черкесогаи）6 人、巴古拉尔人（Багулалы）5 人、科列克人（Кереки）4 人、门诺尼特人（Меннониты）4 人，希腊人-乌卢姆人（Греки-урумы）1 人（2002 年时 54 人）和尤克人（Юги）1 人（2002 年时 19 人）。

从以上资料可见，与 1989 年的族群数量相比，出现在俄罗斯联邦 2002、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中的族群数量明显增多，且没有指出自己族属的人也呈大量增长的趋势。

二、族群识别的运作方式

1. 人口普查前研究机构为官方统计部门提供“族称名单”和“族群名单”

根据相关论述，苏联及当今俄罗斯的相关研究机构在人口普查前要为官方提供两种与族群识别有关的名单，一种是人口普查时居民填写族群成分（族籍）时可能填报的“族称名单”²，这一名单主要用于普查前进行编码和普查后的计算统计；另一种是供官方确定最终族群数量的参考名单。就是说，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名单，第一种是居民可能填报的族称名单，进入名单的族称会拥有一个代码，用于计算机统计，没有代码的只能归于最终族群名单的其他类别；而第二种是体现居民族群成分类别的参考名单，官方以“居民的族群组成”名义正式发布的族群数量正是在此名单基础上确定的^[9]。

苏联编制族称和族群名单的历史最早源于上世纪初俄罗斯研究居民的部落组成委员会的活动。当时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准确地确定，有哪些群体并以什么样的称谓生活在俄罗斯境内。在苏联进行 1926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曾围绕界定族群的标准展开过讨论，在本次人口普查时就已经预先编制了回答“族群属性”问题的类别用于编码和普查结果的计算^[10]。在二战后 1959 年的人口普查前，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参加了“苏联的族群名单”的编制，以及最被认可的族称名单的编制，该名单列出了普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回答形式。这一实践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保持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人口普查中沿用了进行族群识别的这一方式，如根据“2002 年人口普查中的数字政治”一文的介绍，在人口普查之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订，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除为本次人口普查提供了近 900 个族称的名单外，还拟定了一份“为便于深入研究全俄 2002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族群名单”，这个名单仅仅具有参考意义，不是最终的名单，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如该所研究人员当时拟定的名单中包括 156 个族群和 23 个亚族群，比 1989 年的 128 个要多 28 个，而最终确定的名单有 142 个族群和 40 个亚族群。主要差别在于研究人员

¹ 族群具体名单可参见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第 355-362 页。

² 学者们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大量前期的实地调查和前一次人口普查中人们填报的族称情况等综合选定。



提供的名单中不包括这样一些“俄罗斯族群”：美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等，共约 30 个，而最终的名单却把这些人数不多的主要是外国的公民包含在内，因此使族群名单的数量增多了，学者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认为不应该把这些群体算作本国的族群^[11]。

2. 在人口普查页中设置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个人申报

在苏联时期及俄罗斯联邦的历次人口普查中，在普查页中居民要填写“您的族群”（《Ваш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或“您的族群归属”（《Ваш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这一问题，所属族群名称由公民自己填写。

如一位在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学习的女学生申报自己为俄罗斯族人，而她的父亲是卡尔梅克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她的选择是被认可的。她的理由是：她一直都在使用俄语，成长在俄语环境中，现在在语言学系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专业，因此既不觉得自己是乌克兰人，也不是卡尔梅克人，而是俄罗斯族人^[12]。

从表 2 可见，在俄联邦 2002 的人口普查中，出现了大量没有申报族属的人，占到总人口的 1%，而 2010 年时则上升到了 3.9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普遍认为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出生于族际通婚家庭的人难以抉择自己的族群身份。如在 2002 年的普查中，根据追踪调查资料，卡尔梅克国立大学的某学生就因难于选择而没有申报自己的族籍，他的父亲是俄罗斯族人，母亲是卡尔梅克人^[13]。另外一些原因如有，随着大量的人口外流，人口普查员根据其行政登记资料在其人口普查页中仅填写了年龄和性别，其他什么都没有填写；还有大量生活在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在普查时对调查的信息也填写不全面，如未填写“族群成分”的人员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州所占的比重最高，而在农村这样的比例则要低得多，总体上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是 5% 和 1.2%^[14]。其他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3、族群名单的确定

在苏联、俄罗斯的人口普查中，虽然个体的族群身份采取“自我确定”即个人申报的原则，但族群名单及数量最终由官方确定。

总括地讲，苏联、俄联邦的族群名单是国家统计部门以民族研究机构的建议为重要参考，对居民申报的族称进行归并、分类最终确定的。如 2002 年的人口普查事先编制了 900 个可能的族称名单，其中被居民使用的族称有 776 个，最后将全国 1.45 亿人口归并为 182 个族群。

表 3 2010 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族群分类举例

族群名称 (所含族称)	所含族称数(单位:个)		人口数量(单位:人)	
	2010	2002	2010	2002
中国人(Китайцы): 苗、台湾人、藏族、汉、汉族	5	3	28943	34577
鞑靼族人(Татары): 讲鞑靼语的巴什基尔-鞑靼人, 巴什基尔的鞑靼人, 喀山人、喀山鞑靼人、鞑靼人、鞑靼-巴什基尔人等。	13	11	5310649	5554601
阿斯特拉罕鞑靼人(Астраханские татары)	1	2	7	2003
克利亚申人(Кряшены)	6	3	34822	24668
西伯利亚鞑靼人(Сибирские татары)	13	19	6779	9611
麦谢拉人(Мишари)	4	-	786	-
克里米亚鞑靼人(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 克里米亚人(Крымцы)、鲁伽伊鞑靼人(Нугай татар)	2	4	2449	4131
俄罗斯族人(Русские): 大俄罗斯人、反正教仪式派的信徒、古老信徒派教徒、莫罗勘派教徒、鄂毕本地户、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全家迁居到外贝加尔的旧教徒的后裔、西伯利亚人、旧教徒、西伯利亚的土著等	30	15	111016896	115889107
哥萨克人(Казак)	1	1	67573	140028
(白海及北冰洋)沿海居民(Поморы)	2	1	3113	6571

资料来源：2010 年全俄人口普查最终结果信息资料//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erepis2010/perepis_itogi1612.htm

从上表可见，在俄罗斯联邦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中国人被承认为一个族群，其中包含的族称有苗、台湾人、藏族、汉、汉族 5 个。鞑靼族人名下归并了 13 个所谓的群体，克里米亚鞑靼人被看作是与鞑靼族并列的独立于鞑靼族之外的族群，而另外的阿斯特拉罕鞑靼人、克利亚申人、麦谢拉人、西伯利亚鞑靼人被看作是鞑靼族的亚群体，但也都是一个族群。就是说，实际上鞑靼族被区分为 6 个族群。归并在俄罗斯族名下的族称有 30 个，哥萨克人和白海及北冰洋沿海居民是俄罗斯族的亚群体，但也算作是两个族群。本表中未列入的其他族群如犹太人则被区分为 4 个族群，其中中亚犹太人和山地犹太人是犹太人的亚群体，而格鲁吉亚犹太人是与犹太人并列的族群；归在阿瓦尔人（Аварцы）下的亚族群则达到 14 个。

总体而言，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联邦在族群分类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不同：第一，在正式的族群名单中取消了以前有等级意味的归类（如类似于“达吉斯坦的各部族”，“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部族”这样的大类别）；第二，族群数量显著增加，意味着以前“未被承认的”一些族群的地位得到了承认，这被看作是对苏联时期对文化、语言上有某些差别的族群的不承认政策的纠正；第三，通过“亚群体”的形式，即把一些群体作为大族群的“内部”群体，使得大量的族群认同得到承认；第四，在新的“族群名单”中纠正了一些人口较少族群称谓中的错误等。

三、族群名单中的政治考量

概括地讲，在苏联、俄罗斯联邦的人口普查中，族群身份的识别采取的是个人申报和官方归并、分类的原则，虽然个人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有充分的表达权利，但最终能否在正式的族群名单中得到承认则取决于官方，而官方的认定无疑除要考虑群体的历史、文化因素外，政治上的考量也十分重要。

首先，在族群总体数量的多寡方面，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特别强调族群融合的时期，族群的数量具有减少的趋势。如苏联著名的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Ю. В. Бромлей）在比较 1926 年、1959 年及 1979 年人口普查结果中的族群数量时认为，如果在 1926-1959 年期间国家居民的多样性具有减少的趋势，那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最具活力的族际和族内整合的过程已经过去”^[15]。这里所讲的与其说是族群的融合和分化过程，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族群识别中官方意志的变化。应该说，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族群的融合及分化过程都应是逐渐地、缓慢地进行的，而非像苏联时期那样一些族群会突然“消失”，然后又有可能突然“复活”。在当今俄罗斯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民主、宽容、尊重文化及认同多样性的大背景下，自然更多的族群认同得到承认，官方意志容许其族群数量大幅增长以显示其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变化。

在具体操作方面，无论是对外国人独立族群地位的承认方面，还是原住居民的族群地位是否给予认定方面，都有着政治上的考虑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因素有关。如对美国人、英国人等外国人群体作为苏联、俄罗斯联邦独立族群的承认，显然政治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美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等外国人群体，不同于中国人（如早在 1897 年的俄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居住有 5.7 万中国人，其中 4.1 万人居住在远东地区）、朝鲜人等，不仅人数很少，其迁移史也很短，苏联曾以自己的族群中有美国人等自豪，俄罗斯官方更是扩大了对外国人群体独立族群地位的承认，以显示其对族群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政治。但本国的学者们认为，从族群人口和历史文化的观点看，一些外国人群体如美国人、黑山人等与俄罗斯人民不相干，学者们认为应该将这些群体归在“其他族群”类别中^[16]。



在原住民群体的认定方面，当如果没有来自共和国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时，一些具有独立认同的族群的地位则更容易获得联邦官方的承认，如对别谢尔缅人（Бесермяне）作为独立族群的认定，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其“统计学上的独立性”表示反对，所以该群体在俄罗斯成为了独立族群。同样的原因，索奇特人（Сойоты）得以从图瓦人中、库曼京兹人（Кумандинцы）和捷列乌特人（Телеуты）等从阿尔泰人中单列出来获得了独立族群的地位。而当俄联邦官方感受到来自共和国政府方面明显的政治压力时，那些虽有较强烈的族群认同但不曾拥有独立地位的群体就很难从原有的归属群体中独立出来，其实大量“亚族群”的出现正是政治妥协的结果。

如在2002年的人口普查前，除克里米亚鞑靼人早在苏联时期就被承认为独立族群外¹，在鞑靼人中另有阿斯特拉罕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和克利亚申人等多个群体有着独立的族群认同，特别是克利亚申人要求被承认为独立族群的意愿更为强烈，其领袖人物阿列克西（П. Алексий）甚至给总统普京写信，论述了在人口普查结果中承认其为独立族群的必要性；而时任鞑靼斯坦的总统沙伊米耶夫（М. Шаймиев）也致信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认为如果承认这些群体的独立地位就是“按宗教特征分裂鞑靼民族”^[17]。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妥协，这三个群体以亚群体的形式出现在了2002年的族群名单中。同样的原因，为了避免在族群人口普查问题上与达吉斯坦共和国政府层面的冲突，最终的族群识别结果迎合了当地政府的意愿，即把大量有独立认同的群体归在了阿瓦尔人（Аварцы，含14个亚群体）和达尔金人（Даргинцы，含2个亚群体）两个族群之下，这导致了该共和国第一层级族群数量的减少，第二层级即亚族群的数量的扩大。^[18]

从俄罗斯族人的族称情况看，与2002年相比，2010年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新增加的大部分族称来自于2002年普查中的“其他族群”类别，其中很多是俄罗斯族人称谓的地方变体。从俄罗斯人族称的归并情况看，依据的应主要是历史渊源、文化宗教等因素。至于哥萨克人，众所周知，该群体是16世纪不堪伊凡四世统治的俄罗斯农奴逃离俄国中部而迁到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后逐步形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他们的来源复杂，除有俄罗斯族人的后裔外，还有乌克兰人、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鞑靼人等的后裔。在苏联时期虽有被识别为单一族群的强烈意愿，但一直未得到承认。苏联解体后，哥萨克人的一些族群精英和沿海居民中从事历史文化复兴的社会领袖也要求把自己的群体确认为独立族群，2002年的人口普查中俄联邦对哥萨克人和沿海居民的族群身份以亚群体的形式予以承认，他们的数量在人口普查结果中单列，但他们仍然是俄罗斯族人的组成部分，但将讲乌克兰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的哥萨克人分别归在了以上相应的群体中。从表3可见，2010年时哥萨克人的数量从2002年的14万减少到6.75万人，减少幅度达50%以上的原因，除了人们族群认同上的变化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显然，将哥萨克人作为俄罗斯族人的亚群体虽有历史渊源、文化等方面的缘由，但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这样做可以在反对“分化”派和独立派之间形成平衡。

可见，上述用折中途径即按照双重族属“群体-亚群体”原则对部分族群认同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适应了相当部分居民中存在的复杂的族群认同现象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本群体中有着一定传统思想的人如一些族群精英等反对“不要分裂自己”、“不容许族群数量上的减少”等等有关的愿望得到满足，因此，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内部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四、两点讨论

¹ 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与鞑靼人并列为独立族群的认定，应主要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克里米亚鞑靼人不仅在地域上远离其主体，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该族群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地位，在苏联时期从1959年起的历次人口普查中就一直被承认为独立的族群。



1、苏联、俄罗斯联邦族群识别方式的利弊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苏联从1926年开始就在人口普查中调查人们的族群归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辨识、归并确定国家的族群数量，这一方式一直延续至其1989年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沿用这一方式对国内的居民进行族属调查和族群的归并和认定工作，尽管在做法上有了一定改变。

众所周知，族群认同具有复杂的和动态的本质，上述方式的合理性在于，苏联、俄罗斯官方在人口普查中把个人的族群属性、族群认同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问题，并没有将其固定化，而是给个体比较充分的表达族群认同倾向的权利。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人们对有关族属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人们不一定按照学者们界定的族群特征来确定自己的族属，而有可能把族属理解为地域的、民俗的或者甚至是民族命名的群体归属，也可能理解为是宗教群体或族群的地方分支等，因此在所属族称的表达上会反映出有自称、他称或者宗教称谓，或者同一称谓的地方变体或方言变体等等形式。另一方面，人们的族属认同具有可变性，此时的认同和彼时的认同也可能不同，特别是在只能选择单一族属的情况下，那些族际通婚的后代以及那些因文化交融不能明确确定自己族属的人可能会处于摇摆状态，而苏联、俄罗斯的这一识别方式为人们的认同变化提供了可以改变的可能性。如典型的例子是巴什科尔托斯坦的跨巴什基尔-鞑靼的居民，他们在几次人口普查中有时登记为鞑靼人，有时登记为巴什基尔人。

但是，这一运作方式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多民族（族群）国家要确定其族群数量的情况下，必然要对自报的族称进行归并、分类或者说进行族群识别，而这涉及到把哪些人归到哪个群体里的问题，而归并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群体识别如果没有一套比较有说服力的辨识依据，其认定的族群名单就难以取得认同。苏联人口普查中族群识别的实践说明，其最主要的不足之处就是把大量具有独立认同的群体事实上被迫并入其他群体以组成更大的族群，这种情况曾引起了一些未被承认群体的不满，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的群体识别实践。

另外，从我们上面呈现的数据看，苏联、俄罗斯每次人口普查最终结果中承认的族群数量都不一样，而且有时有较大起伏、一些族群消失又出现的问题等都说明，在苏联、俄罗斯的人口普查中对族群识别的依据缺乏连贯性的运用。如对本国的原住居民群体一般根据历史渊源、语言文化上的相近性等进行识别归并，但也出现一些小群体有时被单列为独立族群而有时又被归并到其他族群中；还出现了一些群体在不同次的人口普查中被归到不同大群体中的情况等。

在苏联、俄罗斯联邦的人口普查中，将来自外国的移民或者仅仅是外国公民也纳入族群名单的做法，不仅使其族群数量大量增加，而且也破坏了其族群识别依据的一致性，如对外国人群体的归并通常只能按国家的居民称呼，如西班牙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等，则不能考虑他们的族裔属性（如巴斯克人或者加泰隆人，普什图人或者乌兹别克人等），否则其族群数量难以控制。当然，因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俄联邦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架构已经完成，其族群数量的增多并不会对其民族区域自治的设置产生影响，很多族群的存在其实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2、中国、苏联民族（族群）识别方式的异同

长期以来，在我国广泛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对苏联的模仿，且这一观点似乎已成公论，但实际上因国内一直缺乏对苏联族群识别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2010年我国著名学者王希恩研究员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从苏联对其境内的族体做了不同性质的分类、“以国定族”对各族体做了大规模的归并等方面进行探讨后认为，这种对族体的分类和归并并不需要对各民族做出严格的族属上的辨析，这种基于民族是与社会发展形态相对应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分类和归并与以辨明族属为目的的民族识别并不是一回事，并得出结论认为，“从已有的材料和研究来看，苏联的‘民族识别’很可能子虚乌有”^[19]。本文赞同王希恩研究员有关“中国实行民族识别的根本原因和方法不是对于苏联的模仿，而是根据自己民族工作的需要和具体的国



情出发”的观点，但本研究认为，苏联这种基于个人认同基础之上的对族群的归并、分类，虽然和中国通过严格界定的民族识别不一样，但也是一种族群识别。

中国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首先是把群体作为识别的对象，识别的理论依据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在我国民族识别中……，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参照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确定为汉族。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20]在此基础上，将符合标准的个体成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明确的民族身份登记在户籍中，且一般不能更改，在人口普查时只能填报为户籍所属的民族。而苏联的族群识别则采取的是由“个体”到“群体”的方式，虽然人口普查中的族属申报并非一定要源于世系推定，体现的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原则，但在最终的族称的归并、族群的分类上，官方也要依据历史渊源、语言文化上的联系等方面进行辨识；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虽然苏联人口普查时个体的族群身份申报有较大的自由，但实际上，由于苏联时期在公民身份证上、各种表格上登记族群成分的做法，使其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强化和固化着个体的族属意识，而其族属一般也是出生后被登记为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族属。因此，无疑苏联人口普查中的族群分类也是一种族群识别，只不过在识别的标准、连贯性上没有我国的民族识别那么严格¹。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和苏联实行的民族（族群）识别虽在方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中国遵循的是先“群体”后“个体”的识别规则，而苏联则采取的是由“个体”到“群体”的方式，但实质上都是“一种政府参与的国家行为，有着不可抹煞的政治意义，（都是）……给予了复杂的民族存在一种法定裁决”^[21]。就是说，苏联和中国的民族识别都是对族类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在这一点上二者是殊途同归。

总之，族群识别是国家语境中的政府行为，是不同国家在其自身界定的族群标准的框架内，在兼顾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基础上对族群存在的一种国家认证行为，这一行为或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或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至于这种把各族群成员相互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是否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而那些没有得到承认或者得到了不符合当事人意愿的承认对该类群体的认同倾向会产生何种影响，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参考文献：

[1][19] 王希恩，“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2] 此数据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词典和百科全书网站提供的资料统计。

<http://zrada.org/inshe/43-literatura/320-natsionalnyj-sostav-rossii-perepis-1897-goda.html>

[3][12][13] Этнография переписи 2002 года. Под ред. Е. Филипповой, Д. Ареля, К. Гусеф. М.: Авиаздат, 2003. Стр.316,211,33.

[4][8]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0. Стр.5-8,9-11.

[5]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емограф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¹ 实际上在我国 1980 年代以后民族识别的归并、民族成分的更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等工作中，出现了大量个体的民族成分与其“世系”并不一致的情况。相关研究如可参见刘正爱：“‘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陈心林：“从族群到民族：地方认同与国家分类的博弈与互惠——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



экономики»[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ерепись_населения_СССР_\(1939\)](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ерепись_населения_СССР_(1939));<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289743>

[6] <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289743>

[7]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Д. Перепись 2010: этнический срез.

<http://www.perspektivy.info/print.php?ID=193983>

[9][10][18] Тишков В.А. 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10 года: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для ретроградов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для чиновников и политиков.http://static.iea.ras.ru/articles/O_vserossiyskoj_perepisi_2010.pdf.

[11] Тишков В.А. Этн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5. Стр.309.

[14]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Д. Перепись 2010: этнический срез.

<http://www.perspektivy.info/print.php?ID=193983>

[15] Бромлей Ю.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этнографии. М.:наука, 1981г. стр. 330-331.

[16][17] Эт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ониторинг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Под ред. В.В. Степанова. –М.: ИЭА РАН, 2011. стр. 17-18, 20.

[20] 国家民委党组，“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情况报告”，国家民委办公厅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115.

[21] 王希恩，“民族识别是对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5日.

【论 文】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¹

包刚升²

摘要：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关键词：族群； 宗教； 文化多元主义； 民主； 同化

随着英国选择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崛起，以及新选择党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三大政党，西方世界似乎已

¹ 本文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

²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